

哲学史



新编中国

THE NEW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二) | VOL.2

劳思光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哲学史



新编中国

THE NEW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二) | VOL.2

劳思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B2
219
V2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中国哲学史/劳思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2

ISBN 978-7-108-05232-2

I. ①新… II. ①劳… III. ①哲学史—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1720 号

目 录

导言：总论中国哲学之中期——附论汉唐文化问题	1
第一节 释“中期”之意义	1
第二节 本期中国哲学之演变历程	2
第三节 汉唐文化对士人心态之影响	5
第一章 汉代哲学	10
第一节 汉代哲学之外缘观察	11
第二节 汉代哲学之内在解析	14
第三节 汉儒之没落	16
一、心性论问题之分裂	16
二、阴阳五行说与汉儒之关系	17
第四节 道家思想之肢解	22
一、“超越我”之形躯化——道教	23
二、文化否定论之孤立化——放诞之风	23
三、“守柔”与“无为”之技术化——黄老之术	24
第五节 董仲舒与“天人相应”之观念	26
第六节 《礼记》之思想	32
一、《礼记》一书之特色	32
二、《大学》与《学记》	34
三、《中庸》之时代及其理论	44
四、《乐记》之理论	56

第七节 《易传》之思想	64
一、《易传》与卦爻辞违异	65
二、《易传》乃杂辑而成	70
三、《易传》中之特殊论点	74
四、《易传》理论之评论	85
第八节 《淮南子》、扬雄与王充	89
一、《淮南子》	89
二、扬雄之思想	96
三、王充之思想	104
第九节 结语	116
第二章 魏晋玄学	117
第一节 玄学之根源及分派	117
一、玄学与儒道之关系	118
二、才性派之特色	119
三、名理派之特色	121
第二节 “才性”之说	123
第三节 “名理”之说	130
一、何晏	130
二、王弼	132
三、向秀与郭象	138
第三章 中国佛教哲学	145
第一节 总说	145
第二节 印度佛教教义述要	147
一、原始教义	148
二、大乘教义	157
第三节 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及讲论	187
一、初期之概况	188
二、北中国之佛教	190

三、南中国之佛教	204
附记：本时期之重要佛教史著作	230
第四节 中国佛教之三宗	232
一、天台宗	234
二、华严宗	244
三、禅宗	256
附记：关于禅宗之重要著作	265
第五节 返归印度之佛教思想运动	266
一、《唯识三十论》要旨	267
二、玄奘及法相宗	269

后 记	274
-----	-----

书目略录	278
------	-----

导言：总论中国 哲学之中期

——附论汉唐文化问题

第一节

释“中期”之意义

本书第一卷论述先秦时期之古代中国思想，此时期即可称为中国哲学思想之“初期”。本卷则论述由两汉至隋唐之哲学思想，此时期即称为“中期”。至于宋代至明清则为“晚期”，属本书第三卷。

中国哲学史成立较晚，不似西方哲学史所采分期标准，大抵有成例可循；于是，哲学史作者只能依一定理据，自提分期之标准。就多年来已刊行之中国哲学史著作而论，冯友兰氏之书，独以“子学”及“经学”为区分，于是中国哲学史只划为两个时代。其理据不过以“开创”与“发扬”对分而已。如此分期，似嫌过简；且对于中国佛教思想之特性，汉宋儒学之不同，皆全无照顾，未为妥善。胡适之氏虽首倡中国哲学史之研究，然其书仅有上卷，续文未成，因此其分期标准如何，殊难测知。此外，如范寿康所刊印之讲义，则纯以朝代为区分标准，严格言之，非分期之法。此外，又有依学派而划分者，即将中国哲学思想分为“先秦诸子”“两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此似较为妥善。然魏晋玄学与早期之中国佛教思想同时，而中国之佛教思想，亦不始于隋唐；毕竟哲学史之分期，与学说之分派不能全同；盖分期不能不重视时间意义，同时之学派只能归于同一时期也。因此，本书虽在论述学派思想时亦采用类似之划分，然另提三期之标准。

此一划分之理据,在于此三时期中国之哲学思想基本情况不同。就初期而论,此时期乃中国哲学思想之“发生期”。各家思想承古文化传统,兼受当时历史因素之影响,纷纷出现。就地区而言,有南北古文化传统之异,于是儒学兴于北,道家兴于南。就社会而言,则墨子之说,针对下层民众之需求;韩非之说,纯谋统治者之利益。其间变化分合及理论得失,皆在第一卷中论之。

中期包括两汉至于唐代。此时期中,一面有古学失传之问题。伪书迭出,谶纬风行;儒道之言,皆丧失本来面目。另一面又有外来思想侵入之问题。佛教各宗教义先后传来;中国哲学思想,一时皆受其支配。此时期可称为中国哲学之“衰乱期”,亦即本卷论述之对象也。

至于宋代以后,则儒学力图重振,一面抗拒佛教之影响,一面摆脱汉儒传统之纠缠,遂有宋明之新儒学出现,然此一思潮至清代而大衰。中国哲学思想又呈僵化之象。故“晚期”乃一由振兴而转入僵化之时代。此中演变甚为繁曲,未易以简语形容之。本书亦直称为“晚期”而已。

以上略说三时期中之中国哲学思想之大致情况,其特点甚为凸显,则本书所用之分期理据可明,而所谓“中期”之意义亦可知矣。

以下当先对本期中国哲学思想之演变历程作一概述,然后再附论汉唐文化问题以作补充,而结束此导言。

第二节

本期中国哲学之演变历程

自两汉至隋唐,其间各种哲学问题之起伏变化,颇为复杂;本卷各章当分别析论之。但此一时期作为整体而言,又有“衰乱期”之特色;其所以如此,则与此时期中哲学思想之大趋向有关。本节概述中国哲学思想在“中期”阶段之演变过程,目的即在于对此种大趋向作一说明,而不涉及特殊哲学问题之讨论。

战国末年,法家之说通过秦政权而实现。于是,在政治上,有秦帝国之统一局面;在哲学思想上,先秦诸家争鸣之局亦告结束。秦之施政以防止旧势力复活为主,故极力破坏已有之文化传统,以求巩固自身之统治。此中实无正面理想可言。然以巩固政权为最高目的,亦正是韩非思想之特色;则秦政权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实不待辩也。

在如此政权下,学术思想之衰落,势所必然。秦火劫后,讲学挟书之禁,人所熟知。及至秦汉之际,咸阳被焚;官府藏书,亦遭毁坏。于是,汉兴之时,先秦学统大致已绝。新学统更无由突然建立。中国之学术思想遂进入一大混乱时代,而中国哲学之衰落亦于此时开始。

此种衰落乃一大趋势;就不同阶段着眼,则每一阶段中又各有特色可说。

先就汉代而论,汉代哲学思想之衰乱,有两大特征。其一为“混淆”,其二为“伪作”。

汉初,高祖、吕后皆不解学术思想;而其时世乱未止,亦无发展学术思想之良好环境。文帝以后,天下粗安;政府广置博士,以治经学。自表面言之,似是一学术昌盛之局面。然揆其实,则各经师之学,已大失孔孟本旨。盖战国以来,古文化传统早有交流混合之势。秦汉之际,古学既渐失传,思想之混乱尤甚。南方道家之形上旨趣、燕齐五行迂怪之说,甚至苗蛮神话、原始信仰等等,皆渗入儒学。以致两汉期间,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义,而为混合各种玄虚荒诞因素之宇宙论。等而下之,更有谶纬妖言,流行一时。观董仲舒之倡“天人相应”,盛谈符瑞灾异,以及夏侯氏据《尚书·洪范》以作预言,可知其大略矣。

思想混杂之结果,使中国哲学思想退入“宇宙论中心之哲学”之幼稚阶段。另一面“伪作”丛出,又益使先秦思想真义不传。汉代初期,以书简流传绝少,汉廷乃征求遗书。因之,遂有造伪书以献之恶劣风气。其中影响最大者,乃取某种文献资料,伪托为圣哲之著作。如《尔雅》托于周公,《易·十翼》托于孔子,《礼记》中《大学》一篇托于曾子,《中庸》一篇托于子思,皆其最著者也。此类文献所伪托之作者,皆儒家最具权威地位之圣贤人物,于是俗儒乐道其书,学者亦尊信成习。其影响直至唐宋而不改。而孔孟心性之义、成德之学,反为此一套伪作文献所掩。此中国哲学史一大关目,固不仅为中期之大事也。

由于汉代儒者,以言儒学为名,而以倡混杂之思想为实,所据经籍,又常真伪不分,故心性成德之学大衰。至东汉时,中国心灵已极度空虚。印度佛教入侵,中国思想界遂无抗拒之力。

与汉代相比,南北朝及隋唐时代中国哲学思想之衰落,则以受外来思想支配为特征。然自东汉末年至于魏晋,又别有谈玄之风。此即所谓“魏晋清谈”或“玄学”。此种玄学或玄谈,既与汉代经生之传统思想不同,又与外来之佛教思想迥异。其流行在魏末晋初最盛,至南北朝而渐衰。其立说则表面以老庄为依归,实

则先与儒学相混,后乃转为佛教徒所利用。本身固是一最杂乱之思想传统,其所以兴起,实作为中国哲学衰落之副产物而已。

顾此副产物亦有其历史意义,即代表某种“过渡期”是也。两汉思想之粗陋,不能引导哲学思考之进展,亦不能满足价值意识之要求;然终非受外来思想支配者。南北朝以降,以佛教理论为主之思辨,远较两汉之说为精;但基本上受此印度传来之思想支配。而魏晋玄谈则欲补两汉思想之阙失而未得其道,但仍能不依托外来思想或理论,故恰代表一“过渡期”。

魏晋玄谈涉及老庄之诠释、《易经》之论述,以及才性问题之探讨等。大致言之,理论成就甚少。其主要人物之言论皆在后章另有析论。此处但点明其历史意义,以清眉目。

晋室南渡,所谓“南北朝”时代即开始。而佛教支配中国思想之形势亦逐渐形成。佛教虽在两汉间已逐渐传入中国,其初固未能影响中国哲学思想。至东汉末年,国人犹以佛教与祷祀之事并论;所谓“浮屠”之教,盖视为神仙方术一流,未尝深究其教义及理论。三国西晋,译经稍多;始渐有理论研究之倾向。南北朝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人先后兴起,影响所及,遂使佛教教义讲论日盛,流传日广,终成为哲学思想之主流。此趋势至中国佛教三宗于隋唐间先后成立时,遂达高峰。而自秦汉以来,中国哲学思想之衰落,至此亦可谓告一段落。本书所涉之“中期”阶段,即以隋唐时代为终点,盖衰乱后之重振,已属“晚期”之事矣。

若以南北朝与唐代相较,则大同之中又有小异。盖佛教乘中国心性论之衰而得占据中国思想之主坛,由于其教义强点之得发挥;然佛教虽能立“主体性”,因而能建立独特之心性理论,其说又别有一限制。当佛教在中国流行既久,此种限制遂日渐显出,于是,其教义之弱点亦不可掩。结果导生唐代反佛教之思潮。此又是唐代哲学思想之一小潮流,为南北朝所无者也。

此所谓佛教教义之限制或弱点,简言之,即其“否定世界”之精神方向。佛教教义之能透显“主体自由”,固无可疑,然其“自由”,仅属一种“静敛”之自由,故对世界取舍离态度。自小乘诸说至大乘之真常教义,虽似步步建立不舍众生之说,然彼岸为觉,此岸为迷,此中界限绝无可除之理。世界为无知所生,众生为业识所缚;一切说法修持,总以渡往彼岸为究竟宗旨。“不舍众生”只就渡化而言,非谓此岸本身有何价值也。此义就佛教内部而言,亦不引生理论矛盾;然面对文化生活而言,则其为一大否定,则无可辩。盖世界之“有”,本身既视为一迷妄活动

之结果,则此世界中之众生,唯一大事即离迷妄之此岸而归向彼岸,在此世界中绝无可实现之价值。于是,佛教徒面对此世界,除念念求舍离外,只能随世法而方便应付,不能亦不愿在此世界中有任何建立。所谓“否定世界”,即取此义。

佛教发展至隋唐,已占据中国思想界之主坛;而其影响所及,遂使人对现前世界一切问题均不重视。而就文化生活一面看,制度、风气等等文化问题,均无人以严肃态度探求。进而言之,佛教势力本身在此世界中之存在(不论其教义所指向之境界如何),亦转而引生种种社会问题。此种情况至唐中叶后而益显。于是“否定世界”之精神方向或态度,本身遂成为一种病源(此“病”自指文化生活中之病言);关心此类问题者,遂不能不由反对此种“否定世界”之态度,进而反佛教矣。

唐末思想界已有韩愈、李翱等人先后排佛教,其流风至北宋而大盛。日后宋儒之反佛教,大抵皆以“否定世界”一点为抨击对象。此固与佛教教义本身之限制有关,非偶然之事也。

宋儒之学说,属于本书第三卷范围,不在中期思想之列。然佛教发展之结果,使此种趋势酝酿日熟,则在本卷析论佛教教义时已露端倪。而此一思想趋势,因起于唐代,故顺及之。

总观本期中国哲学思想之演变历程,其大致脉络亦甚明显。最初有汉代儒道思想之变质变形,其后内有清谈之兴起,外有佛教之入侵;最后,佛教占一时优势,而其教义之限制亦唤起自然应有之抗拒思潮。而中国哲学之衰乱期亦至此为极。迨宋儒兴起,中国哲学重振其活力,则已非本期之范围。

演变历程既如上述。以下,当附论汉唐文化之某种特色,以作补充。

第三节

汉唐文化对士人心态之影响

上文专就哲学思想本身着眼,故判定汉至隋唐为“衰乱期”。若就制度、风气等其他层面着眼,则汉唐文化自各有其特色,且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之心态至大。故于此节择要论之。

汉代乃中国正式建立中央政府并推行统一制度之时代,论汉代文化之特色,亦当以此为重点。但在论述汉代制度之前,又有须稍加说明者,即思想与制度之

发展次序问题(或先后问题)。

一时代之思想,可影响后一时代之制度,但多不能影响当时之制度;反言之,一时代之制度特色,亦大抵皆来自前一时之思想,而不必关涉同时之思想。此理至为浅显,盖思想影响制度,例必经一酝酿过程;当某种思想表现为一新制度时,后起之思想可能另有新转向。因此,一时代之思想与制度间,尽可呈现种种歧异冲突,并非必然互相配合。此点亦治哲学史及思想史者所宜留意。

就汉代而论,政治制度之设计,最合先秦儒家之思想,而汉代之思想则适表现儒道二家之没落。此即上文所谓歧异冲突之实例也。

汉代之政治制度,可视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最具代表性者;盖汉承秦后,其时古代封建制度业已崩坏,而秦祚甚短,所遗制度仅具规模而未详密,于是,汉统一后,所立制度实为一大设计。此中特色,细言之则甚多;然就其最重要者论之,则有以下二项:

第一为内朝与外朝之划分,亦即“君权”与“相权”之设计。

上古君主之权,原无限制;孔孟立说,始渐以立德得民诸义限制君主之行为,故不为当权者所喜。近世论儒学之政治思想者,每谓儒学拥护君权,实则未审儒学兴起之政治环境与历史阶段,未得古史之真相也。周人之封土建君,在古代政治史上固为一大进步,然对于天子诸侯之权力,固未尝依法制予以限定。孔孟提出理论性之规范以限定“君”之理分,在当时即属于最早之限制君权之理论。此种理论以孔子“正名”之说为观念基础,而以孟子之“民本”说为主要内容;其精神方向甚为明显。然孔孟皆未能用世,亦未尝实际设计政治制度以限君权。此种制度之正式设计,即见于汉初,亦即本节所论内朝外朝之分划是也。

所谓“内朝”,指皇室及宫廷而言;所谓“外朝”,即指政府而言。天子在理论上为全国之业主,但其管理权则仅及于“内朝”。“外朝”之首领为丞相。丞相主持国政,管理“外朝”。天子有置相、易相或罢相之权,但不能直接管理“外朝”。此是中国独有之制度设计,亦是汉代文化之重大成绩。

在此制度下,天子譬如商业机构之董事长,而丞相乃管理一切事务之总经理。所不同者,商业机构之董事长甚至重要董事,可以自兼总经理职务,而依内外朝之制度,则天子不能自兼丞相。故产权与管理权明确划分。而天子与丞相之权力,互有制衡作用,即不能有绝对专制。

此种制度,虽非“虚君制度”,亦可称为“半虚君制度”。倘能严守不渝,则君

主专制之恶果,可以大半避免。然汉代虽立此制度,其实行则为期甚短。武帝之后,君主即逐渐扩充内朝势力,以夺丞相之权。虽在法制上,丞相地位并未丧失,事实上则君权日大。故就实际政治言之,君权之为害,实属中国政治上之大病;然其所以如此,非由于未能设计限制君权之制度,或全无限制君权之思想,乃由于此种制度虽已设计,并已实行,而国人未尝严守法制而已。此中问题界限,不可混淆。

倘论中国政府组织之演变,则相权之衰落亦可作为一主要线索。盖君权既侵相权,即逐步以内朝官吏管理政事。后世掌政务之官职,如“尚书”之类,考其始皆属内朝。内朝官吏日益重要,即君权日益扩大之后果也。

相权之演变问题,乃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时必须注意之关键问题。本书非考论政治制度之作,但以论汉代文化之特色,略及数语,不再详说。

汉代哲学思想虽衰,然而承前代思想设计之政治制度,仍有重大意义。故本节首先述及。

第二为汉代之选举制度,亦即沟通政府与社会之制度。

古代之部落社会,统治全凭强力,自无选才制度可言。且古代掌统治权之贵族同时亦垄断知识,社会中难有人才之培养。即以周代而论,虽有学校制度,并无一定选拔人才之轨道。汉代初兴,用人偏重军功,亦不可谓得抡才之道。但其后建立选举制度,遂建立一法定程序,使社会中之人才可以进入政府。此种制度日后发展为中国科举制度,对后世社会及知识分子心态影响至大。

以考试及荐举选拔人才,使政府与社会有一恒常之沟通途径,乃科举制度之特色。而汉代之选举,即此种制度最早之形态。与唐以后之科举相较,汉代之选举仍以地方长官之推荐为主;人才获得推荐,始能接受朝廷之考选(即所谓“对策”)。其影响所及,遂使士人视荐主如君上。而后世门阀之风由此开端。另一面,士人既以受举荐而登朝为正途,遂产生一种“助手心态”,以辅佐他人作为政治生活之常轨。此点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治问题之基本态度,实有决定性作用。学者不可不正视此一事实也。

但一制度本身之意义,与其推行中所生出之流弊,又不可混。专就考试制度本身言之,其观念基础实出于儒家选贤与能之说。盖中国传统中政权之建立大致皆恃武力,故开国君主例重军人,而所谓有“佐命”之功者,大抵皆以征战之士为主。然治国属建设之事,与征战之事迥异,故“马上得天下”虽可,“马上治天

下”则不可。此义在汉初即为人点破。而欲得才以治天下,便不能不求之于军人功臣之外;于是,如何建立轨道,使天下之贤能皆可进入政府,成为一重大问题。汉代之选举,即考试制度之初步设计,而考试制度又即是针对此大问题所提之解答也。

总之,就考试制度本身而言,实代表中国古代政治之一大进步,亦是汉代文化之另一重要成果。至其演变及流弊则另是一事。

汉代立内外朝之分,以限制君权,立意虽善,实行则未能长久;变质过速,其效不彰;以致后世论中国政治传统者,每对此重大观念全无了解。而考试制度则情况不同。汉之选举仅为考试制度之初期形态。其后,发展为唐之科举,直贯宋及明清诸代,成为中国之独特制度,故论史者多能言之。兹即以此点为线索,引至对唐代文化特色之讨论。其间变化,亦可顺陈数语。

唐代与汉代间,中隔三国、两晋及南北朝。就考试制度而言,可谓一度中衰,至唐方转盛。而此制度之功能,亦自唐代以后方渐得发挥。

东汉表彰气节,极重舆论;此种风气下遂产生一种社会势力,影响政治。此种势力其始固以知识分子为主,但发展既久,遂先有朋党,继有门阀。至曹魏时,立“九品中正”之制,人才之进退基本上受门阀势力之支配,荐举考试之功能殊不能发挥。由两晋至南朝,此种社会形势无大改变。而另一面,两汉选举制度,本有促成荐主与士人间私立门户之弊;此弊转归门阀之潮流中,其势亦甚为自然。终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此种社会情势下之考选,殆徒具虚名矣。

若论门阀势力之正式崩溃,则须迟至晚唐;然唐代之考试制度,在早期已开始发挥效力。其关键在于投牒自试,不待荐举。

士人读书,可以自行参加考试,此即所谓“科举”。唐代既许投牒自试,荐主遂不复关重要。而如此推行考试制度,其开放性方正式建立。故无论就世族之社会影响言,士人如何受此种风气之限制,就制度本身言,考试制度至唐代可谓业已长成。

唐代之公开考试制度,可视为唐代文化之一大特色。而其对知识分子心态之影响,则尤堪注意。欲对此问题作一疏理,则首须回溯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之演变。

古代知识分子与贵族为一事;平民大抵不得受教育之机会,亦不甚渴求知识。周末始有民间之学,所谓“王官失守,学在四方”是也。然即以战国而论,其

时有土之贵族即为知识分子之供养者；士人倘不出仕，大抵即恃贵族供养以为活。墨子讥儒者不治生产，当亦属实情。而孟子固亦谓“惟士无田”也。此种贵族养士之风，至秦汉而变。如汉初淮南王之聚门客，固犹是古代诸侯遗风，然就大形势而言，则一面有博士官学及博士弟子入仕之法，另一面又有选举之制，皆使知识分子之生活方式渐有变化。此种变化，约言之，即由作贵族门客转而作政府官吏是也。

两汉士人，固多躬耕自食者；然当此时，此类士人实只是从事农人工作以自活。作为知识分子而言，其发展固皆寄于出仕一途，其所学亦皆供出仕之用；未有真以其所学寄于农事者也。士人之偶从事他业者，亦皆类是。

两晋及南朝之世族，本身大抵属知识分子，而其力量足以影响政府。人才之选用既为世族所左右，士人之依托世族而谋生者，固仍是出仕而已。

唐代考试制度确立，就政府言，乃一大进步。然就知识分子而言，则益使士人以仕宦为主要生活方式。其后直至明清，基本上无大改变。

此处有一问题，在思想史上至关重要。此即知识分子既以出仕为谋生之常道，则其从政并不须有任何政治理想或主张。而由此之故，知识分子虽经常参与政治，但对政治制度之种种基本问题，皆常不予注意。结果则使中国士人对政治理论贡献特少。反之，治学有得者，大抵以不积极从事政治为清高。此点在宋代尤为明显。宋儒立说，可谓代表中国哲学之极盛时期，然独于政治制度理论毫无建立。倘不知此与传统心态有关，则必觉其难解矣。

唐代知识分子，就思想言，除佛教人物外，其余殊不足论，然其心态则影响后世至巨。中国政治哲学之不发达，实受此种心态影响。故本书于此略论之。至于唐代文学艺术之盛美，则与本书无关，不能论及。

上节论汉唐文化之特色，只偏重政治思想一面，盖就哲学思想本身言，下文另有论述。而政治思想问题，在下文无单独析论之机会，故乘总论中国哲学中期之便，略作陈述，作为附论，以供学者参考。

本卷导言即在此结束。以下各章分论自汉至唐之中国哲学思想。

本卷所讨论之中国哲学之中期,开始于汉代。两汉四百余年,虽无大哲学家出现,然此一阶段中,学统大乱,伪书曲说迭出;思想及学术风气均陷入极端失常之状态中。就中国哲学史言,此时期实是一大变化发生之时期,故学者虽可不重视此时期之种种理论,然对此一阶段本身则不能不有确定了解。

以下当分数步,析论汉代哲学思想。

第一步先作一“外缘观察”,即对汉代之历史环境作一描述:盖汉承秦火之后,历史环境至为特殊,本书虽非纯史学著述,然对有关哲学思想盛衰之历史条件,亦不能完全置而不论。因此种描述与哲学内部问题无干,故称为“外缘观察”。

第二步当对汉代之思想趋势作“内在解析”,此指析论先秦哲学思想在汉代如何演变而言。汉代之儒者,理论立场与先秦孔孟相去甚远,然仍自命承孔子之学。汉代人对道家之了解,亦与先秦老庄之说大异。此种变化本身自亦有理路可寻。“内在解析”即是就哲学问题及理论本身说明此种演变。

第三步当分别讨论儒道二家变化之实际情形,如汉代儒者与阴阳家之关系,及道家如何分为三支等等。此即下文之三、四二节。

其下则分论董仲舒之思想,《礼记》一书所包含之几种有关哲学之文献,《易传》之思想,以及《淮南子》、扬雄与王充等人之思想。

此中,《礼记》及《易传》之问题尤为重要。《礼记》本西汉儒生编纂之书,其中资料来源极杂,时代亦有早有晚;然当时人皆视之为先秦文献。其中《大学》《中

庸》二篇，旧说竟以为一出于曾子，一出于子思，皆在孟子之前；对于书中显属晚出之证据，视而不见。此种奇怪看法，至朱熹而益甚。朱熹作“四书”之注释，不唯认定《大学》出于曾子而《中庸》出于子思，且分“经”分“传”，任意颠倒次序，以求合于己见。此后，所谓儒生竟懵懵然奉为定论；虽偶有辩争者，朱说仍不失其势力。于是，《大学》《中庸》等属《礼记》杂收之作，乃被人看作儒家典籍，与《论语》《孟子》并列。实可笑可怪之事。

《易传》之作，虽非一时之事，然其不与《易》本文（卦爻辞）同源，亦甚显然。而后世儒生，动引《十翼》之言，视之为《易》，已属荒唐。且或指《十翼》中之《系辞》为“孔子所作”，全从汉儒之臆说，则荒唐中之尤荒唐者。

宋儒昧于古史，又不通训诂；对书籍之真伪先后，全无判断能力；而其立说，又特喜依附《易传》及《学》《庸》等。于是，自北宋至朱熹时，诸家之说，竟使本属伪托之书愈来愈重要。今日吾人明知北宋诸人谈《易》，乃有根本错误者；然亦不能尽废其书，只能指出彼等误以伪托于孔子者为真而已；盖以讹传讹，久而难返于实也。

本书在第一卷中，已对孔孟之“心性论”有一描述；本卷中对汉代托名孔子或先秦儒者之作，则皆略作辨析，以期学者不再将“心性论”与“形上学”，甚至“宇宙论”之说相混。此实有关于学者对孔孟思想之真方向之了解，非小事也。

此外，本书论及《淮南王书》（《淮南子》）者，乃因此书代表汉代人心目中之道家——即“杂家化之道家”。又论及扬雄，则因扬雄半儒半道，亦为一典型之人物；非谓《法言》《太玄》于理有何可取也。换言之，扬雄之有重要性，乃从哲学史观点看时之判断。至于王充，则《论衡》一书，虽属浅薄，然代表反阴阳五行之东汉思想，亦有哲学史之意义。若王充本人思想之欠一致性，则书中另有论述。以上为概说。

第一节

汉代哲学之外缘观察

汉政权之成立，在秦亡及楚汉相争之后。秦始皇用李斯之言，废除百家之学，令民“以吏为师”；其时除卜筮、医药、种树之书外，其余简策皆禁止人民藏有；凡人民所藏之书，皆勒令交官吏焚毁，此即所谓“秦火之祸”。